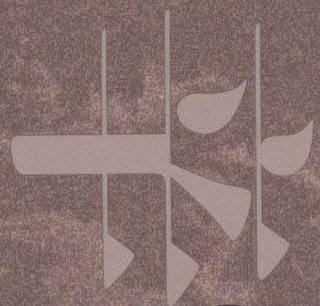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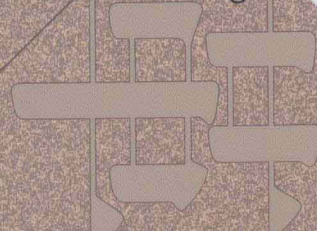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 组编

严昌洪 / 主编

Xinhai Gem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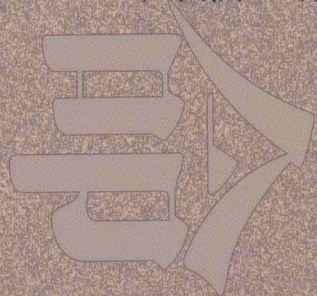
Shishi Changbian



第一册

(1894.1-1897.12)

严昌洪 / 编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严昌洪 / 主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 组编

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本书为2008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立项号[2008]013）成果 XINHAI GEMING SHISHI CHANGBIAN



武漢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1894.1-1897.12)

第一册

严昌洪 / 编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第一册/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严昌洪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430-5280-2

I. ①辛… II. ①武…②严…③严…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2456 号

组 编: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主 编:严昌洪

编 者:严昌洪

责任编辑:王远彦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25 字 数:402 千字 插 页:5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 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Xinhai Geming Shishi
Changbian

序

期盼已久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即将出版，这是为辛亥百年大庆奉献的一份大礼。

排比史事，编年实录，是中国史学延续已久的优良传统。金毓黼先生早在抗战时期就曾说过：“史官记注、官署档案、州郡计书、文士别录、金石之志、地下之藏，无一不为史料。如可葺录、保存、考订、编次，以至传世行远，吾国先哲，实优为之。又如撰史之初，广蒐史料，辑成长编，长编即为葺录之后，再加以考订、编次之功，例如唐宋以来，官修之实录、会要，悉属此类。近人于此一端，用力颇勤。”

对于中国近代史事研究来说，此项工作尤为重要。因为近代史时间跨度虽然较短，但其史料范围之广、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语言文字之复杂，则远远超过古代与中世纪的任何断代史。加以又属新兴学科，史料的葺录、保存多半属于草创阶段，并且非常分散，而“考订、编次之功”更缺少足够的覆盖面。在这种情况下，严谨的学者每进行一项重大课题研究，都得从头做起，亲自从事史料排比与不同程度的史事长编制作。其中艰难困苦，多数年长学者皆曾亲历。就辛亥革命研究而言，因为学龄更幼，基础欠缺更多。随着这一领域近三十年的迅猛发展，人们愈来愈认识到编撰一套大型《辛亥革命史事长编》，作为辛亥革命研究者随时可以检阅并且足以信赖的工具书，已是事属必行的当务之急。

严昌洪教授急公好义，多年以来都是见难而上，善始善终，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完成了好几项大型工具书的长期编纂工作。如《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下）》，我虽然名义上是副主编，但由于中途忽然谬膺校职，自然难以兼顾此项繁重复杂的学术重任，而身负重望的荣孟源前辈，还未及审订全书词目便过早病故，最后便主要是靠陈振江、苑书义、林言椒、严昌洪四位“少壮派”一丝不苟定稿收尾，终于圆满完成任务。经过这段磨炼，并且能够近距离接触谭其骧等前辈学者，聆听教诲并接受其严谨学术风范的影响，昌洪已经初步具备此类大型编撰工作的领军能力。所以嗣后在《辛亥革命辞典》的编撰过程中，他已经在实际上代替我主持全盘工作。因为那几年是多事之秋，我代表学校进行对外学术交流又非常频繁，只有依靠他来具体料理整个工作流程。及至编撰卷帙浩繁的《辛亥革命大写真》，他已经卓然成家，驾轻就熟，与王兴科、吴剑杰亲密合作，自始至终、一丝不苟，出色完成了此项空前大型的图史编撰。我这个主编虽然并非完全挂名，但多半也能省心省力，忙于处理自己手头的其他紧迫任务。师生之间，固应尊师，但

更应爱生。学生每每让老师当主编，这是一种尊重，一种礼貌，甚至是一种早就该废除的陈旧学界“伦理”。作为先生，我从来没有把这些“潜规则”视为理所当然，因而也就从来不敢贪天之功，更不愿掠后生之美。以上是必须说明的真实情况，正如《平凡的神圣——陶行知》的撰著主要应归功于唐文权、《湖北通史》主编工作应归功于罗福惠，而《张謇与近代社会》的写作应归功于田彤。

列举以上所述事实，更为重要的还是在于说明，正是由于历经这些工作磨炼，昌洪不仅已经具备了独立主编更为大型学术工具书的必要资质，而且还大为增强了开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程并且出版大学通用教材的底气。教学与科研，相得益彰，岂不美哉！

但是，并非很多人都认识到史料整理与编撰工具书的重要性。特别是由于相关管理部门的无知，评估科研完成的指标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更使许多年轻教师不愿花费较多精力从事此项重要基础工作。幸好碰上辛亥百年这样的大好时机，才有可能让辛亥革命史事长编这样特大型项目顺利通过，并且得到武汉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长编》的主编及其团队，都是研究辛亥革命多年且有资料编辑丰富经验的历史学者。可以相信，《辛亥革命史事长编》将是继《辛亥革命辞典》以后，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发展又一个重大贡献。

当然，辛亥革命研究毕竟仍是一个新兴史学领域，在学术研究与史料整理两方面都还缺乏坚实基础。因此，很难要求现今出版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完美无缺。特别是在辛亥百年大庆的有力感召下，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几乎每天都在不断涌现，《长编》由于出版时间限制，也没有可能吸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涵盖这些新的史料发现。正如任何一部大型史料结集与史事长编出版一样，它也需要经历若干岁月，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批评建议，在再版中认真加以增补、订正。

章开沅

2011年仲夏于桂子山

凡例

一、本书依据辛亥革命发生、发展和结局的时间顺序，辑录、排比有关社会背景、革命组织、舆论宣传、武装斗争、政权更迭、清方应对、外国干预和社会变迁以及各种政治派别、各方面重要人物的活动和各地民变等内容之史料，以期反映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及其引起中国社会巨变的历史作用，并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基本资料。

二、本书起迄时间为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至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适当追溯孙中山等革命主要领导人早年事迹。大致根据时间段与资料多寡情况分为10册。

三、本书采用编年体与纲目体相结合的体例。纪事按时间先后系年系月系日，每日下以史事概述为纲，言简意赅；相关史料摘引为目，准确无误。史事无明确日期者，按旬、月、季、年系于当旬、当月、当季、当年之尾，如“上旬”系于当月10日之后，“夏初”系于农历四月之尾，“夏”系于农历六月之尾，“年”系于当年之尾，等。一日多事者，分条列举，首条标明时间，其余各条用△标示。一事之首尾系于首日之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仅列纲文，目文从略：(1)与辛亥革命关系不甚密切如背景者；(2)纲文记述足以说明问题者；(3)仅知史事记载，缺乏详细资料者。

四、多种资料并存者，选录信史；所引史料需加考论或说明者，加编者按置于该条之后，文字较少者则直接在引文中加以括注。

五、本书纪年，统用阳历，后附农历。每年于篇首标明公元年代，加注清帝年号或中华民国纪年及岁次干支。如，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年)或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年)。每日则在公历月日之后括注农历月日，如，10月9日(八月初十日)，但某年农历月日首次出现时，括注中加上干支纪年，如，1月5日(甲午年十二月初十日)，1月26日(乙未年正月初一日)。

六、所引史料，均注明出处。史料前注明作者(纲目已有交代者或从略)和篇名，史料后注明该篇出处，标明作者或编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卷号页码。引用报纸期刊标明报刊名称及出版时间或期数。如引用原文为新闻报道，一般采用在正文开头注明时间及出处，如：“1912年某月某日《某某报》报道(载)”，文后可省注出处。史料出处按现代规范统一表述，出处时间原署清帝年号者，保留原年号，加注公历，如“宣统二年(1910年)刻印”；原署民国纪年者，无论1949年以前或以后，均改为公元纪年，如“民国二十年出版”写作“1931年版”，“民国六十五年版”写作“1976年版”。原署卷数、页数等用汉字者，统一改为阿拉伯数字，如“卷二”，“页二十

五”，写作“第2卷”或“卷2”，“第25页”。

七、凡引用史料基本保持原貌，所署纪年和农历月日一仍其旧。原文文字除当时用语习惯如“计画”、“规画”、“豫算”等继续保留外，繁体字(含异体字)如“於”、“擔”等通常采用简体(正体)“于”“担”；人名、专有名词中的繁体字如陆徵祥的“徵”，谘议局的“谘”，通常不改作为“征”、“咨”；所据底本若已将“计画”、“豫算”等改为“计划”、“预算”等，则依底本不变。

八、对所引用史料中的错衍漏脱加以审慎校勘。文字错误改正尤为审慎，除明显的排版错误加以改正外，不以现代汉语之规范来改正，古汉语字义相通者，通假字者，人名、地名、译名等，一般不作改正。原文错字改正用[]，衍文删除用〈〉，漏字补录用【 】，有疑问者用[?]，原文字迹模糊不清或脱落者用□，文内原有注释用()。本书编者说明性文字较少者亦用()表示，惟于语尾加上“编者”二字，以示与底本原有注释相区别。底本校勘符号，含义与此不同者，则改为一致，以免两歧。至于标点，通常不改，惟破句或改后不妨害文义者，则少量顺手改之，不另标识。

九、引用电文，如为去电，附录复电，如为复电，附录来电。一时查无复电或来电者，暂阙。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年)以前

中国革命先行者、辛亥革命领导者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的产生并非始于兴中会成立之日,早在1879年(光绪五年)至1883年(光绪九年)在檀香山求学期间,已萌改良社会,拯救同胞之志愿。

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1912年5月7日):

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9页

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年) 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孙中山始决心倒清。

孙中山《建国方略·有志竟成》:

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9页

1886年(光绪十二年·丙戌年) 孙中山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学医,其动机为“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记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事:

孙总理名文,字日新,后改逸仙,广东香山县翠亨乡人,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四十六年丙寅(一八六六年),幼读书乡塾,闻乡中父老闲谈太平天国遗事,义形于色,隐然有匡复之志。十三岁随侍母杨太夫人赴夏威夷之茂宜岛,就乃兄德彰公所设商肆习商业。越年肄业于檀香山英文学校,攻读五载,学冠侪辈,时夏威夷土人渐受美国自由空气所鼓荡,反对土王及西班牙统治之声四起,总理耳濡目染,民族民权之观念油然而生,十八岁后归国,从名宿区凤墀、陈仲尧补习国学,于历代兴亡掌故及全国山川形势,尤孜孜研究不辍。十九岁适逢中法甲申之役,清廷割地丧师,举国共愤,总理由是逐满救亡之企图,益为坚决。二十一岁以耶教洗礼牧师美人喜嘉利之介,由香港皇仁书院转学于广州美国传道会所创博济医院。课余,辄与同砚议论时政,人多忽视,独有郑士良号弼臣者,惠州归善县人,少入洪门三合会,豪侠尚义,颇负时望,闻总理谈吐,辄为倾倒,总理与之志同道合,遂与商谈救亡大计,士良极愿届时罗致东江一带会党以参加义举,总理由是获悉交结各地秘密会党之门径。其后乙未广州、庚子惠州之革命两役,即发端于是。又有顺德县人尤列号少紈者,为广东舆图局测绘生,与洪门会党素有往还,偶偕族人博济医院出身医师尤裕堂同至博济访友,与总理一见如故,自是常至博济访总理及士良畅谈国事,是为总理在粤交结革命同志之第一年。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3~4页

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

在檀香山求学时,课余从杜南山先生习国学,某日见其架上有医科书籍,问何以需此?杜答:“范文正公有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窃采此意耳。”而国父颌之。异日再往见杜,曰:

“君为我奉范氏之言，窃以为未当，吾国人读书，非骤能从政，即从政矣，未必骤秉国钧，倘殚心力以求作相，久不可期，然后为医，无论良医不易为，即努力为之晚矣。吾意一方致力政治，一方致力医术，悬其鹄以求之，庶有获也。”

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台湾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第28页

他在校结识了郑士良。孙中山《建国方略·有志竟成》：

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接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9页

孙中山曾对宫崎寅藏谈及郑士良的性格：

在许许多多的同志中，我没见过比他更奇怪的人。他是我广东医学院和香港医学院前后六年的同学，但他却从没来上过课，也不看书。在学业之余，如果有人谈政治论革命的话，他一定来旁听。他绝不自动发言，但他却要旁听到底。……迨至我医学院毕业，在澳门开设医院，他完全没有跟我商量，就退学并到我的医院来。……到广东的时候，他也跟我来，仍然无所事事。我长期地观察他的举动，知道他喜欢革命，所以我跟他商量过一切，但他只说是或不是，因此我无从知道他的底细。（广州第一次起义时，）必需有三合会的支援，只要跟三合会取得联络，便可成立近乎完整的革命军，因此大家便开始讨论此事。这时郑君笑咪咪地说“我就是三合会的头目”，并微笑着。

陈仁鹏译《论中国革命与先烈》，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印行，第163页

1887年（光绪十四年·丁亥年）孙中山在香港雅丽氏医学院学习，与尤列、陈少白等订交，以洪秀全自许。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记孙中山在香港雅丽氏（Alice，亦译作雅丽士）医院事：

是年何启博士为纪念其亡妻雅丽士，在香港荷理活道创办雅丽士医院，聘康德黎博士为院长。总理以雅丽士医科设备较博济完善，乃由广州转学该院。同学有关景良、江英华、黄康衢、陈少白、王泽民、郑汉淇诸人。总理在校恒喜谈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轶事，且以洪秀全自命，故同学多以洪秀全呼之。就中与总理最密切者为新会人陈少白，尝与订盟为兄弟。其人文学优长，多才多艺。总理时好投稿香港各报及上海《万国公报》，发表改良时局意见，辄与少白商榷行之。后数年总理所撰上直督李鸿章书，即肄业雅丽士时腹稿也。少白以性情不近医术，在校两年余而辍学。总理课余失此良友，后常引为憾事。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5页

冯自由《尤列事略补述一》：

丙戌（一八八六年）夏偶偕族人尤裕堂医生至博济医院访友，获识孙总理、郑士良等，是为孙、尤二人订交之始，然以友谊不深，均未敢披沥肝胆引为同志也。戊子（一八八八年）冬充广东沙田局丈算总目。翌年充广东舆图局测绘生，旋被派委中、法越南定界委员。因于政界有所感触，决然舍去。适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有招考书记之举，以欲借此谳习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同考者四十余人，竟获入选。因忖香港乃言论自由之地，就此为排满鼓吹，计亦良得。一日至歌赋街杨耀记商号，访算学馆学友杨鹤龄。时孙总理方学医于雅丽士医院，

与鹤龄为同乡,亦常到杨耀记叙谈。二人相遇时,有友多人在座。总理方高谈时事,意气激昂。少烝曰:“诸君未见洪秀全。”指总理云:“此人之头脑即与洪秀全同样矣。”总理指答之曰:“你是游智开。”盖尤、游同音,而当时游智开为广东巡抚也。满座皆粲然。次日总理遇少烝于道,乃邀至威灵顿街杏楼西菜馆小叙。总理曰:“昨日之言,幸暂守秘密。我前在檀香山教人造反,因民智尚未开通,无从著手,今幸相遇,便是同志,彼此次第斟酌进行可也。”少烝曰:“既如此,我只望成事,谁居其功不计也。”自是二人交谊有如胶漆,频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间。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31页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回忆道:

孙先生在雅丽氏医学校读了两年。那时我在广州念书。有一天,我有事到香港去。在没有到香港去以前,在广州见到一位姓区的老朋友,这位老朋友,既是认识我,又是认识孙先生的。他说:“你到香港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人,这个人恐怕同你见解很相合的。”我说:“很好。”他就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到了香港,就请王宠惠的父亲王煜初牧师,领我到雅丽氏医学校内见孙先生。王煜初介绍我们之后,就告辞去了。孙先生见了那封介绍信,就很高兴的同我谈话起来。大约过了十分钟,他就说:“我们去逛逛公园吧!”我当时初次到香港,也不知道什么,就跟孙先生到了一个植物园,择了一个很静的地方,两个人坐下,谈谈时局,觉得很入港。谈到革命的事,也是很投机。最后他就问我:“这次到香港要耽搁多少天?”我说:“只有一天,马上要走的。”他就说:“无论如何要想法常常谈谈。”这样分别以后,过了几个星期,我自己因为家境日就艰困,预备到香港去半工半读,减轻家里的负担。一到了香港,当然时常到医院里去,在孙先生的宿舍内谈天,天天谈革命的事,总是很高兴的。

柴德赓、荣孟源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1),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年) 孙中山在香港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倡言革命,被时人目为“四大寇”。

《清稗类钞·方言类·广州方言》收录并解释了“四大寇”现成词语:

四大寇,犹言四大强盗也。外省人落魄者,结成团体,以乞食为事,如有喜事,必来送喜,其实乞赏钱也。

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26页

孙中山《建国方略·有志竟成》:

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烝、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往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9页

冯自由《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

四大寇者,革命时代孙总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之绰号也。杨为广东香山翠亨村人,生于澳门,家世豪富,性不羁,喜谐谑,与总理结识最早。有商店在香港歌赋街曰杨耀记,

尝在店内独辟一楼,为友朋聚集谈话之所。总理至港,恒下榻其间。尤列,字少纨,顺德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当总理习医于广州博济医院时,有尤裕堂者,早年在博济医院毕业,悬壶于顺德乡间,偶因事偕其族人尤少纨至博济访旧,道经十三行,见有博济学生孙逸仙、郑弼臣、邓景晖等,因购荔枝事与水果店有所争执,裕堂遂向前劝解,相偕回博济叙谈,并介绍少纨与总理及弼臣相识,是为孙、尤二人纳交之始。陈少白原名夔石,后改名白,字少白,粤之新会人,广州格致书院(即今岭南大学)开创时为第一期学生。其父子桥之友区凤墀以其少负奇气,乃介绍之至香港雅丽士医学校访总理,少白从之。晤总理后,一见如故,总理劝其改入医校,以便晨夕切磋,少白于是迁港,同学二载,以天性不近辍学。在此期内,少纨亦在港任华民政务司署书记。故孙、陈、尤、杨四人每日在杨耀记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之。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广州失败之后,总理奔走海外,力谋举兵,百折不磨。少白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宣扬革命,不遗余力。少纨创中和堂于南洋群岛,且发刊《图南报》,开南洋革命报纸之先河。独鹤龄蜷伏澳门,无所表见。民十,总理修治广州观音山文澜阁,特招少白、少纨、鹤龄三人居之,盖不忘兴中会前四大寇之旧谊云。壬辰(一八九二年)十月十五总理于医校毕业后数月,曾与少纨、少白、鹤龄、关心焉等合摄一照。关号景良,与总理同学医校,后总理一年毕业,至今尚在香港行医,即站立四人背后者是也。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总理邑人有杨鹤龄者,向热心兴汉逐满之说,有先代遗业商店在香港歌赋街,名杨耀记。总理课余,以乡谊关系常偕陈少白访鹤龄叙谈。顺德人尤列与鹤龄同为广州算学馆学生,时任华民政务司署文案,亦常到杨耀记访鹤龄话旧。于是四人时常会合,高谈造反倒满,旁若无人。鹤龄更特辟一室以为政谈之所。时人遂戏呼四人为四大寇。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页

△是年,孙中山上书曾任津海关道及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而病休居乡的郑藻如,提出兴利、除害、培植人才的主张。

《致郑藻如书》全文如下:

窃维立身当推己以及人,行道贵由近而致远。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方今国家风气大开,此材当不沦落。某之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第以所学虽有师承,而见闻半资典籍;运筹纵悉于胸中,而决策未尝施诸实事:则坐而言者,未必可起而行。此其力学十余年,而犹踌躇审慎,未敢遽求知于当道者,恐躬之不逮也。

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贫,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而得之于赋畀者;又不敢自弃于盛世。今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然后仿贾生[山]之《至言》、杜牧之《罪言》,而别为孙某《策略》,质之交[当]世,未为迟也。伏以台驾为一邑物望所归,闻于乡间,无善不举,兴蚕桑之利,除鸦片之害,俱著成效。倘从此推而广之,直可风行天下,利百世,岂惟一乡一邑之沾其利而已哉?!

呜呼!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为害,亦已甚矣!远者无论矣,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蚕桑则向无闻焉,询之老农,每谓土地薄,间见园中偶植一桑,未尝不滂勃而

生,想亦无人为之倡者,而遂因之不讲[广]耳。不然,地之生物岂有异哉?纵无彼土之盛,亦可以人事培之。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此实事之欲试者一。

古者怪[圣]人为民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而民乃得安熙于无事。今夫鸦片,物非虫蛇,而为祸尤烈,举天下皆被其灾,此而不除,民奚以生?然议焚议辟,既无补于时艰;言禁言种,亦何益于国计。事机一错,贻祸无穷,未尝不咎当时主持之失计也。今英都人士倡禁鸦片贸易于中国,时贤兴敌烟会于内,印度教士又有遏种、遏卖、遏吸,俱有其人,想烟害之灭当不越于斯时矣。然而懦夫劣士,惯恋烟霞,虽禁令已申,犹不能一时折枪碎斗。此吾邑立会以劝戒,设局以助戒,当不容缓;推贵乡已获之效,仿沪上戒烟之规。此实事之欲试者二。

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他[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返[反]此。呜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此所谓弃天生之材而自安于弱,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则智者不致失学而嬉;而愚者亦赖学以知理,不致流于颓悍;妇孺[孺]亦皆晓诗书。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罢[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而不强哉!然则学校之设,遍周于一国则不易,而举之于一邑亦无难。先立一兴学之会,以总理共[其]事。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其费随地筹之,不给则总会捐助。又于邑城设大学馆【一】所,选蒙馆聪颖子弟入之,其费通邑合筹。以吾富庶之众,筹此二款,当无难事。此实事之欲试者三。

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某甚望于台驾有以提倡之,台驾其有意乎?兹谨拟创办节略,另缮呈览,恳为斧裁而督教之,幸甚。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页

1893年(光绪十九年·癸巳年) 孙中山等在广州抗风轩聚会,倡议组织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

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

壬辰(民前二十年)广州行医时期,时得同志左斗山、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王质甫、程耀宸诸人,遂假双门底圣教书楼后进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为密谈时政之俱乐部,旧友尤列、陆皓东、区凤墀等与焉。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页

冯自由《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补述》:

翌年,总理先后设药局于澳门及广州二地。外观则以医学问世,而实则日聚同志,相与计划革命进行之方略。冬初,开会议于城南广雅书局内南园之抗风轩。盖尤列尝为附设书局内广东舆图局之测绘生,与局员习熟,因得借用之。时到会者,有总理及程耀宸、奎光、璧光、陆皓东、魏友琴、郑士良、尤列诸人。总理提议宜先成立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众赞成之,而不及制定会名。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页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是年春,孙总理由澳门移药局于广州市洗基,易名东西药局,延尹文楷医生为助手,庞文



卿医生为司理,以医术高明,深得政绅商各界之信仰,且存心济世,对贫病者一概施医赠药,所业较澳门尤为繁荣,惟其目的在于联络同志以谋革命,业余之外,所交结者往还者有区凤墀、左斗山、程璧光、程奎光、刘学询、尤列、王质甫、陆皓东、魏友琴、程耀宸诸人。开业未及一载,以交游日广,所费浩大,药局资金多挪作别用,是冬遂有不支之势,寻赴香港,拟向亲友再集资补充,亦无所得,乃派陈少白至广州结束所业。

圣教书楼在广州双门底,系耶教徒左斗山所设,其司事人曰王质甫,专经售上海广学会及大同学会出版各新学书籍,粤人言新学者咸奉为东道主,店内后进为基督教礼拜堂,每星期讲道由王质甫牧师兼任之。孙总理与左、王二人均属同道至好,初假书楼一角设医务分所,以利便城内病者,继在后进礼拜堂密设会所,供同志政谈之需。除左、王二人外,郑士良、陆皓东、区凤墀、陈少白、尤列等常往来其间。乙未兴中会谋起义时,尝假书楼后进贮藏军械及秘密文件,及事泄,左、王等乃尽投入井中。王闻风逃脱,左被逮,赖美国领事保释得免。

尤列原出身于城南广雅书院内广东舆图局,以其介绍,假得局内南园抗风轩为同志聚谈所,孙总理及尤列、陆皓东、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宸诸人恒在轩内议论时政,总理曾提议组织革命团体,惟事未成。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1~12页

1894 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年)

春 孙中山在家乡草拟上李鸿章书。春夏间,孙中山为求见李鸿章,通过已卸任澳门海防同知魏恒作书于盛宣怀弟弟盛宙怀,请盛宣怀设法介绍于李鸿章。

魏恒致盛宙怀函:

荔孙世丈大人赐览:久违渠训,驰系实深。侄卸前山篆回省,值台旌已先期遄发,未获面别,殊甚怅仄。兹愚者,香山县医士孙生,名文,号逸仙,人极纯谨,精熟欧洲掌故,政治、语言、文字均皆精通,并善中西医术,知者甚多,妒者亦复不少。现拟远游京师,然后仍作欧洲之游。久仰令兄观察公德望,欲求一见。知侄与世丈处,既有年谊世好,又蒙青照有素,特属函恳赏赐书函于令兄观察公前先容,感激云[之]情,不啻身受矣。侄赋闲省寓,毫无善状,幸上下人口平安,堪以告慰。省中新政,谅已早有风闻,兹不多赘。匆匆泐布,敬请崇安,惟照不庄。

兴里侄恒顿首 廿八日

沈渭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页

盛宙怀致盛宣怀函:

敬禀者:顷有沪堂教习唐心存兄之同窗孙逸仙兄,系广东香山县人,精熟欧洲医理;并由广东前山同知魏直牧函托转求吾哥俯赐吹植。附呈原信,祈察阅,特此禀达。恭叩福安。

弟宙怀谨禀 初十日

沈渭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页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杏翁仁兄方伯大人阁下:敬肃者: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俾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专肃,敬请勋绥,惟祈钧鉴不备。

教小弟郑官应顿首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而后返中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并拟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俾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给游学执照,以利遄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肃此再叩,勋绥不备。

教小弟名心又肃

沈渭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0页

编者按:此处所引沈渭滨文中史料有少量誊抄错误,根据戈止牺《对〈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之补正》(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做了订正。

3月8日(二月十二日) 康有为、梁启超联袂自粤至京,准备参加会试。旋因康有为伤脚返回。

《康南海自编年谱》:

光绪二十年(甲午)三十七岁 二月十二日与卓如同入京会试,寓盛祭酒伯熙邸。伯熙先生,肃王从弟也。藏书冠满洲,颇见其秘书、玉牒、金石之藏,园亭幽靓。既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寓。五月六日下车伤足,遂南归。六月到粤。

萧伯赞、刘启戈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4),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6月下旬(五月中下旬) 孙中山到天津求见李鸿章,呈递上书,未获接见。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

癸巳年十二月,孙总理因广州东西药局营业失败,遂回翠亨乡与家人团聚十余日,始赴香港。及晤陈少白,乃出其在乡所草上直隶李鸿章书稿,与少白斟酌字句,谓吾辈革命有二途径,一为中央革命,一为地方革命。如此项条陈得鸿章采纳,则借此进身,可以实行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少白亦以为然。至甲午春,遂偕陆皓东买舟北上。陆原名桂中,与总理同乡同学。总理幼时尝破毁翠亨乡神庙神像,即与皓东共同为之。后任上海电报局译电生。总理以其熟谙上海情形,邀之同行。既抵沪,暂寓三洋泾桥名利客栈,藉港友函介,分访王韬、邓[郑]观应诸人。韬号紫铨,曾中太平天国状元,洪秀全败后,隐于香港,任《循环日报》主笔,别号天南遁叟。总理出示上李鸿章书稿,韬深为赞许,为代修订数语,并函介于直督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观应号陶斋,即《盛世危言》著者。总理在雅丽士医校时,尝去函研讨改革时政意见。郑著易版数次,政见颇与总理吻合。职是之由,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跃如(一般写作宋耀如,编者)二人。廷威为水师将弁,由官应介绍相识。乙未(民前十七年)曾应总理招,回粤参加义举。跃如字嘉树,粤之琼州人,为耶教传道士。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3~14页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赚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务。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他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纸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随便稍为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给李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两间药房收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官应(字陶斋),托他想办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齐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铨,另号天南遁叟)。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 Dr. Legge 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下对于世界智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齐家里一见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厉害。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陶齐看见了,就替他想办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全文如下：

宫太傅爵中堂钧座：

敬禀者：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当今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蕘之采。嗣以人微言轻，未敢遽达。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駸駸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富国强兵之远略，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又有轺车四出，则外国之一举一动，亦无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于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津津启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学由浅而深，自简及繁，故人之灵明日廓，智慧日积也。质有愚智，非学无以别其才，才有全偏，非学无以成其用，有学校以陶冶之，则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盖贤才之生，或千百而见一，或千万人而有一，若非随地随人而施教之，则贤才亦以无学而自废，以至于湮没而不彰。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则虽处布衣而以天下为己任，此其人必能发奋为雄，卓异自立，无待乎勉勸也，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犹[后]兴也”。至中焉者，端赖乎鼓励以方，故泰西之士，虽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宠以科名，自[是]故人能自奋，士不虚生。逮至学成名立之余，出而用世，则又有学会以资其博，学报以进其益，萃全国学者之能，日稽考于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则士处其间，岂复有孤陋寡闻者哉？又学者倘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则其国之士，岂有不专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励之方也。

今使人于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虽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遗贤，朝多倖进。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故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商情谙习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总之，凡学堂课此一业，则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则能仕。且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夫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加之厚其养廉，永其俸禄，则无瞻顾之心，而能专一其志。此泰西之官无苟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倖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秉国钧者,盍于此留意哉!

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自后稷教民稼穡,我中国之农政古有专官。乃后世之为民牧者,以为三代以上民间养生之事未备,故能生民能养民者为善政;三代以下民间养生之事已备,故听民自生自养而不再扰之,便为善政——此中国今日农政之所以日就废弛也。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农田者,今转而为农田之害矣。如北之黄河固无论矣,即如广东之东、西、北三江,于古未尝有患,今则为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于无专责之农官以理之,农民虽患之而无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于茫茫之定数而已。年中失时伤稼,通国计之,其数不知几千亿兆,此其耗于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辟,山泽之不治,每年遗利又不知凡几。所谓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难乎!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如印度之恒河,美国之密士,其昔泛滥之患亦不亚于黄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补天工也。有国家者,可不急设农官以劝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兴矣,荒土辟矣,而犹不能谓之地无遗利而生民养民之事备也,盖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是在急兴农学,讲求树畜,速其长植,倍其繁衍,以弥此憾也。顾天生人为万物之灵,故备万物为之用,而万物固无穷也,在人之灵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养,而土可生五谷百果以养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长六畜以为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尽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别土质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则能反硗土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此农家之地学、化学也。别种类之生机,分结实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质,明六畜之生理,则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权,此农家之植物学、动物学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长,电力能速物之成熟,此农家之格物学也。蠹蚀宜防,疫疠宜避,此又农家之医学也。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此农政学堂所宜亟设也。

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借牛马之劳,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

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劝[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如化学精,则凡动植矿质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广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